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社会学（第一辑）

Sociology

社会学导言

〔英〕 靳斯堡 (Morris Ginsberg) 著 张运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社会学(第一辑)

Sociology

社会学导言

[英] 靳斯堡 (Morris Ginsberg) 著 张 沅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学导言/李天纲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社会学)

ISBN 978-7-5520-1851-6

I. ①社… II. ①李… III. ①社会学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2226号

社会学导言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

电话总机021-63315900 销售热线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印 张: 13.2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851-6/C.142

定价: 72.00元(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1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棒，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苞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英〕靳斯堡 (Morris Ginsberg) 著 張 沅 譯

社會學導言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目次

第一章	社會學的範圍和方法	一
第二章	社會、文化和文明	二八
第三章	種族與環境	四一
第四章	社會生活的心理基礎	七九
第五章	社會的發展	一〇六
第六章	社會階級與經濟組織	一三一
第七章	心理發展的各方面	一六〇
第八章	結論	一八九

社會學導言

第一章 社會學的範圍和方法

我在本章中所要說的，第一、是關於社會學的範圍和它的方法，第二、關於社會學與別種社會科學及社會哲學的關係。

就最廣義說，社會學是研究人類的交互反應和相互關係，以及它們的狀態和結果的學問。理想上，社會學的研究領域，包括人類整個的社會生活，所有人類在生存競爭中用以維持他們自己的一切活動，種種規定他們相互關係的規則與條例、知識與信仰、道德與藝術的各種系統，以及他們在活動程序中，因為社會一分子的身分而獲得和發展的其他任何能力與習慣。

但是這個理想，很清楚設想得過於寬泛了。顯而易見，沒有一種科學，想研究具有無限種類的

人類關係的整個結構，而會有任何成功進步可言的。那麼如何去規劃立定這個領域呢？

對於這個問題，社會學家有過兩種的答覆，他們提出了兩種多少不很相同的社會學範圍的概念。有一部分社會學家，最好的例證是德國社會學家齊穆爾（Simmel）和他的信徒，他們亟欲把社會學與他種社會研究清楚劃分，將社會學在自負的野心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規定它的研究範圍，只限於人類關係的某幾種特定的方面。另外有一派社會學家，雖然明白承認，社會研究的領域是太廣了，非任何一門科學所能勝任，假使真要求進步，勢非有分工和專門研究不可；但他們也堅決主張，除了各種特殊的社會科學如經濟學、人類學、比較宗教、比較法學等等以外，也需要一種一般的社會科學，那就是社會學了。社會學的功用，在於把各特殊社會科學的研究結果，綜合關聯起來；在於研究社會生活的一般狀況，正因為這種的一般性，所以往往是為他種特殊社會科學所忽略了的；要之，它觀察整個的社會生活。這兩種的社會學的概念，一個把它作為一種界域分明的特殊社會科學的一支，另一個把它作為各種社會研究的綜合，兩說都各有其有力的信從者。在開頭先去表明本書究竟採取那一種的態度，是很重要的。

第一種的看法，曾有過各種不同的方式，此地祇能就其中重要的一提。齊穆爾的社會學學說的根據，即在於把社會關係的形式，同社會關係的內容與實質劃分開來。各種的社會關係，例如競爭、服從、教會組織、分工等等，都表現於社會生活的各不同方面，表現在經濟生活，政治生活中，甚至表現在宗教、道德或藝術生活中。一般社會學的任務，即去分析這種社會關係的形式；去把表現於社會關係的實質或內容中的社會形式，抽出加以研究。根據這個觀點，則社會學與特殊社會科學的關係，兩者所研究的題材原是相同，不過社會學從另外一個立足點——即以社會關係的各種不同範式作為研究起點而已。

以多少類似的方式，費爾康（Vierkandt）把社會作為一種專門研究，它討論使個人互相結合成為社會的心理聯繫的各種基本形式；實際的歷史的社會情形，譬仿說十八世紀的法國社會，或者中國的家庭制度，其所以可以注意者，僅在它們可以作為說明某種關係的特殊型式的例證而已，例如它們代表某種的權力關係，或代表社會性的某種程度。但社會學如果要免除空泛與不確切的弊病，它必不可用詳盡的歷史的或歸納的方法，去研究具體的社會。社會學的目的，按照費

爾康，在於應用了直接的深入的分析，對於社會關係的各種不可再分的單位，例如尊敬、羞辱、愛和恨、服從等態度，我們所經驗的對於他人同情贊助的需要，以及連結個人成為團體的聯繫，去得到一種說明。同樣，在討論文化時，依他說，社會學不可去僭越的研究文化演進的實際內容，而與歷史學家相爭。譬如就不該下孔德（Comte）的那種演進三階段律，社會學應該限於發現出變遷和永在的根本勢力。祇有用了一種方法，纔能替社會學的研究，劃出一個明白規定的領域來。

韋柏（Max Weber）以更具體的和歷史的態度討論到社會學，雖則他也是一位想替社會學劃出一個明顯的研究領域的人。他以謂，社會學的目的，在於解釋或「瞭解」社會行為。社會行為，並不包括整個的人類關係，它是專指這一種的活動：出於當事者的意思，與他人的行為有關，並且為他人行為所決定的那種活動而言。至於由一件純物質東西的動作所引起的行為，不能稱為社會的。實在並不是所有人類的交互反應，都具社會的性質。例如兩個騎腳踏車人的相撞，如果兩人的行為沒有故意存心，原只是一種自然的現象而已，兩人相互避讓的動作，以及出事後談話所用的語言，那纔使他們的行為成為真正的社會行為。根本上，社會學只討論合於這個定義的社會

行爲發生的可能性或機會。對於我們所能够加以解釋的，即我們所能瞭解的社會行爲的程序，本諸經驗所成的可能性或者出於統計而得的一般結論，那就成爲社會學的定律。所謂「瞭解」，是指對於行爲當事者（個人或多數）的意思或意義，有充分認識，我們只要應用了通常思想和情感的習慣，以及用了我們所知道的違反通常習慣的變態，就足以去解釋領悟它。韋柏也同樣用了這一個社會關係的一般法則，即社會行爲某種型式的可能性，去解釋各種的社會實體（制度），如國家或教會等。譬仿說，在某種情形之下，有一種固定的勢力，要實施某種型式的行爲，如果有這麼一種的合度的可能性，於是就發生了國家。他把這類的定義，看得非常重要，以爲它們可以避免一個社會學家所容易犯的錯誤，不至於把社會團體加以人格化。

這種的以及相類的把社會學作爲一種專門研究的概念，很明顯包含有許多真理。無論從那一方面看，各種社會關係型式的分析與分類，要爲社會學研究的一部分。不過，也許可以問的，它究竟是不是像那些主張的人所說，已經解決了社會學與特殊社會科學間區別的問題。因爲如果我們對於社會關係在實際生活中的意義，沒有充分的知識，單靠抽象的研究，那麼這一種社會關係

的研究，仍舊不會有什麼結果。例如在研究競爭時，除非對競爭在經濟生活中，或在藝術及知識生活中的表現，有番詳盡的認識以後，很少會有好處可言。甚至倒可以反轉來說，社會關係乃由生命各種活動中不同的因素所決定的，譬仿說服從一事吧，在家庭，在教會，在國家，各有各的解釋。要不是對於這種制度先有了詳盡的知識，就無從決定一件事的是否如此，或不是如此。因此，我們應該把對於社會學的看法，更加擴大些：在把社會學作一般社會關係的研究以外，同時還要附加許多專門研究文化活動各重要領域中的關係的特殊社會學，如宗教社會學、藝術社會學、法律社會學、知識社會學等。這樣一來，卻又恢復了老問題：這種種特殊社會學與比較一般的系統的社會學，兩者間有些什麼的關係呢？我們不是又被帶回到老路上，把社會學看做一種概括的或百科全書的研究麼？

在沒有答覆這個問題以前，讓我們把對於社會學的第二種的看法，稍為詳細一說。我們如果說什麼東西都是布置得好好的，這是因為社會生活的各部分間，原是互相密切關聯着，交織着。就算社會不是一個有機體吧，但它各部分的共同工作，以及因一處的變動可以使全體發生反響而